

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 ——基于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

安宁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亚洲地理研究中心, 广州 510631)

摘要: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积极构建其国家形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综合问题。研究援引批判地缘政治作为理论工具,以在津巴布韦的调查作为经验材料,探讨了津巴布韦不同主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地理理想不再受到以其国家宣传话语主导的基于殖民历史和独立战争的历史叙事所支配。相反,在其快车道土地改革运动、中国“走出去”战略及其与非洲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地缘政治湍流不断等时代背景下,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产生了剧烈变化,不同主体之间(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协会、企业和个体等)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津巴布韦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因此不再受到历史叙事的单方面影响,也受到流动的中国企业、移民及其在地实践,以及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变化与这种实践之间的互动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不断解构和重构。研究拓展了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对话语的理解,强化了该理论与现实问题产生互动的潜力。从应用价值来看,研究讨论了它塑路径对中国国家形象营建的逻辑,对于全球转型背景下如何打造中国国家形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批判地缘政治;地理想象;国家形象;话语;津巴布韦

DOI: 10.11821/dlxb202206015

1 引言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其中一个重要所指便是中国作为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复兴。自2013年提出“中非合作”等国家顶层合作框架以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高举逆全球化大旗的背景下,扛起了全球化的大旗^[1];在非传统国际领域,中国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比如,在西非地区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中国派出了近千名医护工作人员为塞拉利昂和利比亚等国家提供医疗援助^[2];2020年爆发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是最早一批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国家,并承诺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根据中国的国际表现,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跃然纸上。当然,中国关于其国际形象定位也有明确的认识,即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但是,国际社会并非完全认可中国的自我定位。一些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学界就不遗余力地对在中国海外的存在进行抹黑,用“农业殖民主义”“新殖民主

收稿日期: 2021-06-23; 修订日期: 2022-01-2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2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1YJCGJW001)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2171226; Foundation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No.21YJCGJW001]

作者简介: 安宁(1987-), 男, 陕西汉中,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
E-mail: anning427@m.scnu.edu.cn

① 摘自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义”甚至“流氓援助”等词藻对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援助进行抨击^[3-4]。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的真实形象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客观印象显然存在巨大的反差。因此,讨论中国的国家形象不仅需要关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自塑路径,也需要关注其他国家对中国形象建构的他塑路径。目前,尽管如此构建中国作为一个全面崛起的大国形象的话语建构开始不断被提上日程^②,但是国家形象的建构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仍然缺乏强有力的尤其是跨学科的理论支持和综合分析,也极其缺乏来自其他国家作为它者话语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在津巴布韦的两次调研获得的经验材料为依据,探讨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及其机制,籍此希望获得中国构建大国叙事话语的启示。非洲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在海外产生影响的区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自1956年与埃及建交以来,中国与同作为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陆续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联系。截至2021年,中国已与54个非洲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非之间的联系在21世纪初期以来便以中非合作论坛的形式常态化。此外,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非洲国家也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这进一步强化了中非之间的联系。然而,关于中非联系这个话题,已有文献要么侧重于讨论中国官方的话语^[5],要么忽略了这项议题的多元性^[6-8],并没有深刻讨论非洲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逻辑,这对于启发中国如何构建大国叙事来说无疑是颇为遗憾的。因此,本文也具有弥补现有的关于非洲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地理理想象这项议题经验研究不足的价值。

本文首先回顾了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其不足,将该理论视为开展本文研究的理论工具以及在理论层面尝试作出拓展的出发点;其次,本文介绍了研究案例及相应的研究方法;随后,结合相关调查素材呈现了研究的主要发现,讨论了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及其内在逻辑;最后回顾了研究的主要发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国大国话语叙事的可能方向。

2 批判地缘政治理论:一个分析框架

国家形象是传播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广为讨论的议题。在这些学科背景下,国家形象主要是指国家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文化或其他柔性方式增强一个国家的思想、政策吸引力以及营建积极的印象等^[9]。宣传机构、大众媒体、文体交流、政策模式、重大事件、科技、价值观和旅游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国家形象的因素^[10-14]。但是,这些研究显然忽略了国家形象是一个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议题。在深度全球化的当代社会,流动已经植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是跨国流动也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15]。在高度流动化的今天,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在流动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对来自其他地区的物品、人口及实践活动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加深或减弱其对相关国家已有的印象,从而重塑其国家形象。这个过程显然是超越传播学和政治学对国家形象的讨论,而广泛涉及到地理学所关注的议题。

地理学相关研究所涉及到的诸多概念中,与国家形象这一概念最密切的一个就是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它强调了作为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人如何形成其对特定空间或地方的知识体系^[16]。已有的地理想象文献大都强调了空间知识生产作为一种权力产生作用的过程。这一点在赛义德(Edward Said)^[17]和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18]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的重要性。

关于地理想象的阐释中最为典型，他们都援引了福柯有关知识和权力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19]作为其理论依据；当然，地理想象也包括作为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人对地方知识的解构和再加工，从而重塑地方意义的过程，比如，通过阅读重新塑造某个空间或地方的意义^[16]。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人，无论是其对地方或空间知识进行生产的过程，还是其对地方或空间知识进行解构的过程，既包括了对自然环境的生产、建构和重构，也包括了对人及其社会关系等社会文化景观的加工和再加工，这些都被纳入地理想象的讨论范畴。

在新文化地理学中，地理想象与表征、身份认同等概念广泛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事实上，在不同尺度上，即便是同一个概念，不同学科的关注点和核心探讨议题都有所不同。比如，在国家尺度上的地理想象，亦即为本文所讨论的国家形象，在批判地缘政治研究中被讨论得最多。批判地缘政治与传统意义上的古典地缘政治有所不同。与古典地缘政治所强调的自然环境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如陆权论、海权论和空权论）等环境影响论不同的是^[20]，批判地缘政治更多地是去探讨国家间地缘政治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和操纵的，其中既包括国家也包括非国家机构的参与。自1996年Tuathail系统提出批判地缘政治理论^[21]以来，该理论就被广泛地用来查验地缘政治知识在不同场域（如国家媒体、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权威人士^[22]；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等日常生活场域^[23]）如何被不同主体（如国家机构^[24]、女性的身体和具身体验^[25]、移民^[26]、非政府和跨国机构^[27]等）所生产和操纵，剥离其中所反映的隐秘而复杂的知识生产与权力之间的联系，从而解构这种以知识生产为代表的权力不对称关系在空间上的映射，实现对全球政治的理解。

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所倡导的分析框架对全球政治的分析其要旨有两点。首先是对地缘政治知识生产主体主观性的强调。从本体论来说，批判地缘政治强调的地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即对地球表面进行注解（Geo-graphing）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强烈主观能动性的过程，而非对地理环境进行的客观描述^[21]。这意味着在批判地缘政治理论中，地理知识的生产被认为是受到一系列先验的概念所影响，如阶级、种族和性别等^[28]。因此，批判地缘政治学者花费了大量精力去解构地缘政治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其中既包括自上而下的国家机构对知识生产的操纵，也包含了前述提及的日常生活中的知识生产与抵抗（这在流行地缘政治研究领域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23]）。其次，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话语的关注。从认识论来讲，批判地缘政治强调通过话语的解剖来理解地理知识生产和被操纵的过程，及其与政治权力博弈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倡导了将话语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而洞悉全球政治权力表达的方法论^[29]。总体来说，与古典地缘政治强调的环境影响论不同，批判地缘政治从社会建构的本体论、话语作为解构世界的认识论以及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出发，利用地理想象等概念来探索地理知识生产的过程与空间权力之间的耦合联系。基于这种分析框架，现有的批判地缘政治研究对诸多涉及地理知识生产的话语场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其中主要包括但并不局限于演讲、公报、电影、漫画和杂志等文本场域^[30-34]。

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发展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从其在国际政治现象解释中的广泛应用来看，尤其是其对主体性和话语的强调，我们可以发现其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然而，批判地缘政治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发展到现在尚存不足，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迄今为止批判地缘政治研究对话语的关注仍然是受到文本主义的主导，其对话语这一概念的理解仍然相对比较狭窄，往往局限于等同于语言或其他文本符号系统，其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探索。正如Marcus等所主张的，批判地缘政治分析应该“扩大其分析焦点，将话语概念包含在语言和社会实践中”^[35]。事实上，这种主张与人文地理学近十年来的各种思潮是相互呼应

的。比如说,西方人文地理学对非表征理论^[36]、情感地理^[37]、超越人类主义地理^[38]、后人文主义地理^[39]以及拼装理论(Assemblage Theory)^[40]等思想的关注,都推动了超越文本主义的话语及其权力的理解,这些都可以再概念化和理论化话语这一概念,将其纳入到批判地缘政治的分析框架中来。其次,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目前更多的是以一种思维方式的形式出现,缺乏对现实地缘政治的具体指导,因而显得与全球政治实践有点脱节。Koopman等在《批判地缘政治25年后》中也提到“批判地缘政治研究对政策辩论和各种地缘政治参与者缺乏影响”的问题,提出了“必须制定一个替代性的规范框架,以推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发展,并限制与之共生发展的批评”^[41];针对这一批判,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奥斯图尔也倡导了一种“扎根的批判地缘政治”研究,呼吁关注批判地缘政治研究应该寻求如何为政策实践提供信息和改变^[42]。从这个角度来讲,批判地缘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互动也亟待被纳入到其分析框架中来。

本文援引批判地缘政治作为理论分析工具,以津巴布韦作为案例地,讨论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基于文本主义导向、缺乏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等上述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不足,本文拟突破传统的批判地缘政治研究范式,从更加复杂的关系角度去广泛关注文本、社会语境和各种主体的社会实践,超越文本主义来理解中国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话语在津巴布韦的生成机制,并讨论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互动。基于此,本文不仅从现实的角度为中国构建大国话语叙事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弥补了批判地缘政治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其文本主义主导和缺乏现实影响的缺陷。

3 研究案例与方法

研究案例是津巴布韦(图1)。本文主要采用了观察法、访谈法和档案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数据的搜集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电话等方式完成。实地考察持续了3个月,主要是2018年7—8月以及2019年8月期间,分两次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及周边区域展开(图1)。首先,在调研期间,笔者通过观察、深入访谈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对58名在哈拉雷地区工作的中国企业家和商人进行了调查,讲述了他/她们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经验中对津巴布韦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理解;此外,通过与12名津巴布韦居民的半结构化访谈,本文也搜集了津巴布韦社会关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直接经验证据。其次,在调研期间,笔者对数十家中国企业和移民组织(包括商业协会和移民慈善组织等)进行了参与式观察,了解了中国企业和移民组织的运营和管理模式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此外,在调研期间和之外,本文通过档案分析的方法对中津关系以及两个国家的相关社会政治背景进行情景分析,搜集的档案包括:①津巴布韦的社交媒体;②津巴布韦的国家和地方媒体;③中国在津巴布韦的移民主办的中文媒体;④中国国内对津巴布韦和中津关系的相关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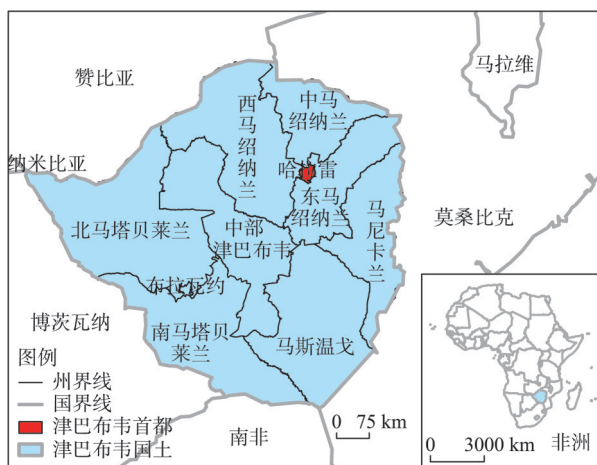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案例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 1 The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case in this study

道等。研究的参与者是通过看门人和滚雪球等抽样方式招募。看门人共有3名,都是中国人且通过笔者的亲密社会关系确定,能够保证与哈拉雷不同社群建立的信任关系。为保持匿名和学术道德,文中不会出现参与者的真实姓名。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基本上明确了影响津巴布韦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想象的几个主导性力量,包括:津巴布韦国家宣传机构、津巴布韦在野政治力量以及津巴布韦普通居民,其中后两类主体受到全球地缘政治情景以及与中国企业、移民和相关组织的日常互动等因素的深刻影响。

4 研究发现

4.1 殖民历史与独立战争:津巴布韦营建中国地理想象的历史语境

从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营建这个问题入手,通过对中津关系的报告、学术研究以及报纸的分析,结合访谈等素材,研究发现,津巴布韦被殖民的历史及其独立战争等历史事实构成了津巴布韦理解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语境,对津巴布韦社会关于中国形象的营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津巴布韦独立贯穿到2017年其政局动荡导致前总统穆加贝(Robert Gabriel Mugabe)下台,甚至到现在。

在1980年实现民族独立以前,津巴布韦是英国的殖民地,叫罗德西亚。在独立的过程中,津巴布韦主要有两大民族势力试图从英国殖民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分别是恩科莫(Joshua Nkomo)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以及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它们相互之间也有激烈的竞争^[43]。其中,人民联盟取得了苏联的支持,民族联盟则寻求中国帮助^[44]。中苏双方都支持津巴布韦反殖民主义战争,但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出现了危机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津巴布韦民族联盟摆脱殖民统治提供了大量的帮助。穆加贝领导的民族联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成为了津巴布韦的执政党。由于民盟与中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随后中国给予津巴布韦的援助,津巴布韦在建国前后与中国形成了牢固的反殖民主义友谊^[45]。例如,穆加贝上任后的公开演讲中就坚定地表达了与中国建立互信关系、坚决支持中国核心国际利益的立场,穆加贝政府的第一项外交活动是穆赞达(外长)访华^[45]。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由于津巴布韦和中国两个国家自身经济都是处于恢复期,所以它们之间的友谊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在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出外向发展趋势,而津巴布韦也因国内经济发展的原因提出了“向东看政策”(Look East Policy)^[46],这些经济领域的机遇将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向了全天候合作。

上述殖民历史和独立战争等历史语境成为津巴布韦社会理解中国国家形象的底色,尤其是参与了独立战争的老兵。调研发现,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理解主要是:坚定的反殖民主义兄弟联盟、热情帮助津巴布韦发展的兄弟国家等。正如一位老兵图鲁(Tuloo),现在是一名酒店的安保人员,谈及中国国家形象时提到:

“我没有去过中国,但是我知道中国是我们的好兄弟,我们曾经一起并肩作战,我还读过毛主席的《论游击战》,非常棒!现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中国人,他们修了公路、房子、超市,还有许多工厂,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我们没有的物品,还有工作,你知道的,我们国家失业率非常高”。(访谈于2018年8月7日,笔者译)

诚然,这种历史背景已经相对比较固化,而全球政治和中津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要素都在不断地影响和重构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理解。下文将对津巴布韦社会对中国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及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剖析。

4.2 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中国“走出去”战略与全球地缘政治湍流

津巴布韦在1980年独立以后经历了短暂的稳定期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开始,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不间断的动荡,这些环境的变化对津巴布韦社会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营建产生了深刻影响。调查显示,影响津巴布韦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主导性社会情景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其中又牵涉了许多相互纠葛在一起复杂的主体,如宣传机构、政党、政治家、企业、移民和相关组织等。

4.2.1 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运动 早在穆加贝领导独立运动期间,民族联盟就明确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纲领,以土地作为获取民众支持的基础^[47]。然而,在独立过程中,津巴布韦与殖民政府达成了一项赋予其独立地位的《兰开斯特大厦协议》,其中明确规定了土地转让细则,包括:禁止强制征收白人正在使用的土地和遵循“愿买愿卖”原则等^[47]。独立后,穆加贝政府实施的土地重新安置运动在白人农场主的百般刁难之下阻力重重^[48]。2000年穆加贝政府起草的宪法草案在公投中遭遇滑铁卢,其关于土地政策的讨论也被解读为不再推动土改运动^[4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政党“争取民主改革运动党(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简称“民革运”)横空出世,以其鲜明的土地政策进一步挑战了穆加贝政府的合法性^[49]。深感国内社会政治危机,穆加贝及所代表的民盟决定迎合人民对土地的需求,重塑国家凝聚力,于2000年7月启动了快车道土地改革运动,最终演化为激进的土地争夺运动,导致农业生产效率迅速下滑,并导致其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体系崩溃^[50]。由于土改的方式过于激进,以前宗主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对津巴布韦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使津巴布韦的经济雪上加霜^[50]。

4.2.2 中国“走出去”战略及其与非洲的联系 与津巴布韦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并于21世纪初进一步深化,转型成为内外兼修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人口流动到非洲国家,包括津巴布韦。据津巴布韦华商会统计,津巴布韦的中国企业和移民在2005年左右以后开始显著增加,在此以前,津巴布韦仅有不到数十家承担援助任务的中国企业,而这一数字在2018年左右达到70余家;同样,原本规模仅有数百人的华人群体,在2005年以后开始剧增,到2016年前后增至1万~2万人。中国企业和移民迅速在津巴布韦的社会经济网络中找到了定位,在烟草、基建、农业、贸易、能源、零售、旅游和餐饮等行业中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尽管津巴布韦国民经济体系的崩溃和中国企业、移民流动到津巴布韦是在津巴布韦“向东看政策”和中国“走出去”政策主导下发生的现象,但是其背后还是深刻体现了两个国家在经济交流领域里形成的非对称关系。这种宏观社会经济非对称关系构成了理解当下津巴布韦社会关于中国国家形象营建的重要背景之一。一方面,津巴布韦的内部社会矛盾可能在外力的推动下,例如与民族主义等情绪形成合力,从而转移到外部,形成排华的土壤;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牵涉中国的组织和个体其社会行为都可能被置于国家间地缘关系的显微镜下,放大成为影响国家形象的因素,对现有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解构和重构。

4.2.3 全球地缘政治湍流:“特朗普主义”的非洲版本 除了土改和中国自身的变化等因素之外,全球地缘政治湍流对于津巴布韦关于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营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Donald Trump)将排华视为其核心的竞选策略之一,意图将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生矛盾外部化为国家间的矛盾,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力量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挑战,因此被首当其冲视为其内部矛盾外化的对象^[51]。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一方面昭示了中国在美国选举政治的推动下成为美国

社会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对象；而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路径为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野心家提供了一条“成功”的捷径。

本文将特朗普采用的将国家内部矛盾外部化以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的焦点，尤其是将矛头指向中国这样的获取和维护其权力合法性的过程称为“特朗普主义”。虽然在“特朗普主义”之前，一些国家的政党也在选举中高举仇华的口号，但是影响甚微。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其影响力非常大。所以，“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取得成功后，也影响到其他国家一些政党，其中就包括研究案例津巴布韦的反对党——“民革运”。在2018年津巴布韦大选中，具有美国留学背景和强烈亲美政治倾向的“民革运”领导人查米萨（Nelson Chamisa）在竞选中打出了通过排华转移国内矛盾这一极具“特朗普主义”特征的策略^③。他将津巴布韦的经济萧条归因于执政党的“向东看政策”，将以中国为代表的外国企业和移民视为破坏环境、扰乱国民经济、加剧社会矛盾的本质原因。此外，在竞选期间，查米萨多次在社交媒体上鼓吹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包括对中国援助、企业和移民的诋毁等^④。不可忽视的是，虽然查米萨最终没能赢得选举，但是也获得了超过40%的选票，说明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调动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也与前述关于中津之间的非对称经济交流关系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形成了呼应。

4.3 从关系认识论看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

在过去的约1/4个世纪里，地理学中兴起了一股关系认识论的潮流，革命性地改变了地理学家对地方和空间的理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梅西（Doreen Massey）^[52]、哈维（David Harvey）^[53]和阿明（Ash Amin）^[54]等学者，都强调了空间是流动的和关系性的，地方更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基于关系认识论，我们容易产生一种外向的地方感，即通过一个地方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来营建其对特定空间的认知，即对一个地方的认知不仅取决于这个地理空间其本体，也取决于认知主体所处社会关系的变化。就像迪特默（Jason Dittmer）对于英国不同阶段对同一个所谓的“战略空间”的不同认知的解释一样，其原因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其全球政治、经济和技术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55]。在本案例中，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理解也随着其内部社会关系及其与中国和全球的关系变化而不断产生变化（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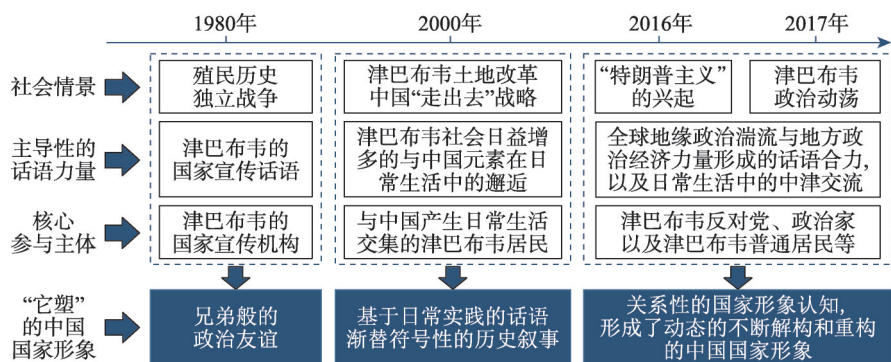


图2 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地理想象框架图

Fig. 2 Framework of Zimbabwe's imagin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具体来说，自独立以来，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宣传层面的国家话语。由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没有全面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③ 查米萨竞选口号中最重要的3条分别为：排华、深化土地改革和向欧美国家学习（源于田野调查）。

④ <https://bulawayo24.com/index-id-news-sc-national-byo-134809.html> [2021-11-16]。

因此津巴布韦的大多数社会主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理解只能通过其国家宣传路径来完成。而自津巴布韦土改及其之后的“向东看政策”实施以来,加上中非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在津巴布韦的中国企业和移民越来越多。这些主体在日常生活维度与津巴布韦社会产生的交集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津巴布韦居民能够通过摸得着、看得见的方式建立起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感知,对原有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解构和重构。从我们的地理学田野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在津巴布韦的企业和移民对津巴布韦就中国国家形象营建的话语影响主要体现在日常社会文化和经济交流等方面,其中涉及不同却互相关联的话语主体之间的协商,下文就这几个方面重点展开讨论。

首先,中国企业、移民在津巴布韦的社会实践涉及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营建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经济和文化隔阂。这种隔阂主要体现在基于语言、惯习和规范等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和不信任,最终上升为对中国作为集体概念的形象认知。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商人通过对津巴布韦市场消费习惯的调查,在此基础上从事富有竞争力的廉价商品贸易活动,而津巴布韦的消费群体不会这样思考,他/她们认为中国人有倒卖低质量商品到津巴布韦市场的嫌疑,因此对中国产生了不信任和相对消极的集体认知。此类隔阂的例子还很多,其中尤其值得关注且影响更恶劣的便是语言隔阂。研究发现,有极小一部分中国移民在与当地居民交流时经常夹带具有歧视性的话语,这些个体层面上的不端行为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社会对中国作为一个集体概念的地理想象,发酵成为导致中国在当地国家形象变差的因素,甚至上升到种族歧视层面成为排斥华人现象的温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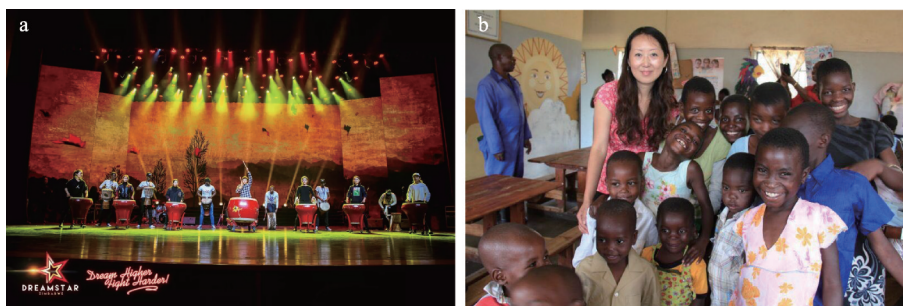
其次,中国企业、移民与及其社会实践对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影响也集中体现在中资企业和华人在地方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一部分中国企业和商人确实在从事的经济活动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环节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津巴布韦经济整体都非常疲软,经济发展的模式也相对比较粗放。在这种经济生态下,一些企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的企业在开发模式上属于传统粗放型,没有充分关注环境破坏和生态修复等细节,引起了地方精英的顾虑,这在田野调查中与本地居民的访谈部分中得到确认。未来这将成为一个潜在的风险。

当然,当下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重构不仅体现在中国向津巴布韦社会流动日益增多的企业、移民及其经济和社会实践所带来的津巴布韦内部社会关系和中津关系的改变等方面。21世纪10年代以来的全球地缘政治湍流,主要包括欧美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特朗普主义”的兴起,以及津巴布韦2017年发生政治动荡后反对党与欧美排华势力的呼应等,形成了当下津巴布韦社会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竞选期间,查米萨通过话语将津巴布韦国民经济的奔溃与中国的存在建立起联系,他在电视演讲、社交媒体等渠道强调是中国人掠夺了资源、抢走了就业机会、制造了经济混乱,这种主导性的话语使得中国与津巴布韦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并且与上述中津之间通过社会实践而达成的关系重塑和国家形象重塑形成了呼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许多津巴布韦人自此开始转变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一改对中国历史革命友谊的地理想象,开始将自身的经济窘迫归因于中国在津巴布韦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一家中国陶瓷厂——YGYF(文中经匿名处理)在诺顿的经历。YGYF是一家投资1.2亿美元并计划提供1600~1800个就业岗位的中国企业,获得了津巴布韦官方的热烈欢迎,并邀请了副总统剪彩。但是,YGYF不仅未能如期竣工,也没有等来副总统的光临,原因在于在大选期间受到查米萨的仇华情绪挑唆,一些富有野心的政治家打上了YGYF的主意。一名叫米利斯瓦(Temba P. Mliswa)的州立法员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响应

查米萨的仇华情绪,他在Facebook上贴出所谓的证据指认 YGYF 破坏环境以及为员工提供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等。这些所谓的“举证”进一步影响了中国在津巴布韦的社会形象,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例如针对华人和中国企业的恶性案件等,这也成为2018年后中国移民数量略有下降的直接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日渐复杂的情景下,这种关系变化对基于关系认识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产生的作用不仅仅是体现在上述消极的层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当然,这种积极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中国企业、移民等行动主体的社会实践层面。调研发现,中国企业、移民逐渐意识到在自身在地化过程中带来的社会文化冲突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对中国作为一个集体概念的抹黑,开始有意识地规范自身行为,甚至开始开展一些增进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活动,以此修缮中国在当地的国家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津巴布韦梦想秀”和“爱心妈妈”(图3)。“梦想秀”是由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以及中非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等华人组织发起、主办和承办的一项选秀活动,旨在为津巴布韦青年提供展示才艺和实现梦想的机会。自2014年始,每年举办一次,挖掘了不少草根明星,推动了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并推动了津巴布韦文化的跨国传播,受到当地社会的好评。“爱心妈妈”是一个由津巴布韦的华人女性组建的一个慈善机构,通过募捐和义卖等方式筹集资金,为津巴布韦十余个孤儿院修建了新的校舍、生产园区,组织了常态化的关怀活动等。这些企业、移民及相关组织的社会活动等实践行为在中国国家形象的地方社会建构和重构中起到极其重要的调解作用。



注:照片由受访者提供,摄于2019年5月6日。

图3 津巴布韦华人组织的社会实践:“梦想秀”(a)和“爱心妈妈”(b)

Fig. 3 "Dreamstar" (a) and "Love in Africa" (b) organized by Chinese migrant organizations in Zimbabwe (pictures from research participants)

整体来看,当下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地理想象不再受到以其国家宣传话语主导的基于殖民历史和独立战争的历史叙事所支配。相反,在其快车道土地改革政策、中国“走出去”战略转型及其与非洲大陆建立的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21世纪10年代以来以美国“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地缘政治湍流不断等时代背景下,津巴布韦社会内部和外部环境开始产生剧烈的变化,不同主体之间(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协会、企业和个体等)的关系开始变得极其复杂,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不再受到历史叙事的单方面影响,也受到中国在津巴布韦的企业、移民及其社会实践,以及津巴布韦内部和外部社会对中国这样的基于社会实践的关系性的看法深刻影响,因此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不断的解构和重构。诚然,这样的重构并不只是全球地缘政治湍流以及津巴布韦内部社会矛盾的投射等因素所主导,在津巴布韦的中国企业、移民和相关组织及其在地化的地理活动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重构和协商起到了重要的调解作用,最终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

5 结论和讨论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快速和深度融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当中。尽管中国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正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积极性,且不断完善自身的大国形象的话语叙事,但是其国家形象的营建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考虑到建构国家形象的我塑和它塑二元性甚至多元性特征,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如何从我塑的角度搭建国家形象的话语叙事逻辑,同时也需要关注它塑的话语叙事逻辑,将其融入到国家形象的叙事体系中来。而在当下中国,讨论有关国家形象建构的议题时,尤其是面临如何协调它塑国家形象的影响时,仍存诸多如理论准备和经验调查方面的不足。

本文以2018年、2019年期间在津巴布韦的为期3个月左右的调查,包括观察法、深度访谈、电话访谈和档案分析等方法获得的数据作为经验证据,援引批判地缘政治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探讨了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津巴布韦的殖民历史、独立战争以及中国在这些事件中给予的帮助等历史事件构成了其社会理解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语境,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营建产生了深刻又积极的影响,这个过程中主导话语生产的主体主要是津巴布韦的国家宣传机构;②对于当下津巴布韦社会而言,影响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最具主导性的社会情景主要包括津巴布韦的快车道土地改革、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及随之而来的与非洲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地缘政治湍流对于地方政治的影响等,这些不同尺度上的情景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津巴布韦内、外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导致包括津巴布韦居民、在野党以及中国在津巴布韦的企业和移民等多元主体都参与到当下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建构中来;③受到多元主体参与话语协商的影响,津巴布韦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在任何时期都不是统一的,而是呈现出多元和动态变化的结果。以当下为例,津巴布韦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主要体现在消极和积极两个维度。其中,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消极的地理想象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津巴布韦的在野党和部分政治家,对于这些主体来说,他/她/它们利用一部分中国企业和移民在地实践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隔阂以及社会责任缺乏等社会事实作为话语建构的依据,逐渐将其替代历史叙事,成为营建中国消极地方想象的依据,并在一些独特的社会情景(比如竞选和“特朗普主义”等)中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积极的地理想象的主体主要包括津巴布韦国家宣传机构和津巴布韦居民等,其中津巴布韦的国家宣传机构已经式微,逐渐被社会实践主导的话语所取代,因此与中国企业、移民和相关组织产生日渐频繁的日常邂逅的津巴布韦居民成为主导有关中国形象积极话语的核心主体,她/他们通过接触和了解中国积极的在地社会实践(如文化交流)等方式对中国国家形象在津巴布韦的营建进行调和和协商,与其他主体一起共同主导了有关中国的动态的国家地理想象。

从研究的理论价值来讲,本文援引了批判地缘政治作为理论分析工具。虽然经过近30年的发展,该理论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理论框架,但是从其对国际地缘政治现象的解释和应用来看,现有的批判地缘政治方法论显然存在对文本主义的依赖以及缺乏与现实政治的互动从而缺乏现实影响等不足^[41-42]。本文突破文本主义的桎梏以及与现实政治互动不足等缺陷,从关系认识论来讨论津巴布韦对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力量的国家形象的地理想象。相比前人的研究,本文发现基于社会实践的话语建构比符号性话语更加摸得着、看得见,更具影响力;而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变化,无论是国家作为主体还是个体作为主体,都与国家形象的营建紧密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讲,本文拓展了批判地缘政治对话语概念的理解,且强化了应用该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文的应用价值与上述理论贡献息息相关。当下中国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是,在这样的场景下如何构建中国国家形象仍然存在较大的知识盲点,目前仍受到自塑路径的局限,缺乏对他塑话语的关注。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话语从来都是多元的:不仅来自自上而下,也来自自下而上的话语建构;不仅通过自我软实力的构建来实现,也需要关注他者的话语逻辑。本文的研究发现最大的现实启示在于,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互联互通的今天,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其海外主体(如企业和流动人口)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实践。日趋激烈的跨国流动带来了愈加频繁的日常生活邂逅,相对于自上而下的话语建构和传播而言,这些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感知可以形成更加强烈的冲击,强化或消解其原有的刻板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将跨国流动主体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实践视为一种话语作为建设国家软实力的基础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研究对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打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大国叙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Liu Weidong, Song Zhouying, Liu Zhigao, et al.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20-636. [刘卫东, 宋周莺, 刘志高, 等. “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进展. *地理学报*, 2018, 73(4): 620-636.]
- [2] Cabestan J P. China's response to the 2014-2016 Ebola crisis: Enhancing Africa's soft security under Sino-US competition. *China Information*, 2021, 35(1): 3-24.
- [3] Jauch H.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frica: Twenty-first century colonialism? *New Labor Forum*, 2011, 20(2): 48-55.
- [4] Naim M. Rogue aid. *Foreign Policy*, 2007(159): 95-96.
- [5] Strauss J C.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Historical and rhetorical lineages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f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2009, 199: 777-795.
- [6] Veeck G, Diop S H A. Chinese engagement with Africa: The case of Madagascar.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2, 53(3): 400-418.
- [7] Lee C K. Raw encounters: Chinese managers, African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casualization in Africa's Chinese enclaves. *The China Quarterly*, 2009, 199: 647-666.
- [8] Mohan G, Tan-Mullins M.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as new agents of developmen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9, 21(4): 588-605.
- [9] Nye J.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5.
- [10] Zheng Tong. On national image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odern Audio-Video Arts*, 2007(4): 38-39. [郑彤. 论国家形象与大众传播. *现代视听*, 2007(4): 38-39.]
- [11] Wu Youfu.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hina's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9(1): 8-15. [吴友富. 对外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国际观察*, 2009(1): 8-15.]
- [12] Jin Zhengkun, Xu Qingchao.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The new task for China's diplomacy.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0, 24(2): 119-127. [金正昆, 徐庆超. 国家形象的塑造: 中国外交新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 24(2): 119-127.]
- [13] Tan Youzhi.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in public diplomacy: Taking China's national image propaganda film as an exampl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 2012(3): 54-60. [檀有志. 公共外交中的国家形象建构: 以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例. *现代国际关系*, 2012(3): 54-60.]
- [14] Feng Xia, Yin Bo. The communication of Beijing Olympic culture and the moulding of national image of China. *Social Science of Beijing*, 2007(4): 72-75. [冯霞, 尹博. 北京奥运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北京社会科学*, 2007(4): 72-75.]
- [15] Sheller M, 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6, 38(2): 207-226.
- [16] An Ning, Zhu Hong. Otherness, pow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Toward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assessment of imaginative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13, 28(1): 20-25, 47. [安宁, 朱竑. 他者, 权力与地方建构: 想象地理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人文地理*, 2013, 28(1): 20-25, 47.]
- [17] Said E.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78.
- [18] Gregory 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94.

- [19] 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1980.
- [20] Parker G.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inter Press, 1998: 25.
- [21] Tuathail G Ó.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
- [22] Dittmer J. NATO, the EU and Central Europe: Differing symbolic shapes in newspaper accounts of enlargement. *Geopolitics*, 2005, 10(1): 76-98.
- [23] Dittmer J, Gray N. Popular geopolitics 2.0: Towards new methodologies of the everyday. *Geography Compass*, 2010, 4 (11): 1664-1677.
- [24] Hu Zhiding, Lu Dadao.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al geopolitical theories from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6): 851-863. [胡志丁, 陆大道. 基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解读经典地缘政治理论. *地理学报*, 2015, 70(6): 851-863.]
- [25] Song Tao, Lu Dadao, Liang Yi,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s, 1996-2015.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4): 551-563. [宋涛, 陆大道, 梁宜, 等. 近20年国际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进展. *地理学报*, 2016, 71(4): 551-563.]
- [26] Ho E L E, McConnell F. Conceptualizing 'diaspora diplomacy': Territory and populations betwix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9, 43(2): 235-255.
- [27] Liu Xiaofeng, Wang Yu, Ge Yuejing. Roles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Human Geography*, 2018, 33(5): 123-132. [刘晓凤, 王雨, 葛岳静. 环境政治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角色: 基于批判地缘政治的视角. *人文地理*, 2018, 33(5), 123-132.]
- [28] Dodds K J, Sidaway J D. Locating critical geopolitic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4, 12(5): 515-524.
- [29] Müller M. Text, discourse, affect and things//Dodds K, Kuus M, Sharp J.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Critical Geopolitics*. Surrey: MPG Books Group, 2012: 49-68.
- [30] Tuathail G Ó, Agnew J. Geopolitics and discourse: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1992, 11(2): 190-204.
- [31] Tuathail G Ó.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critical geopolit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1989. *Geoforum*, 1992, 23(4): 437-452.
- [32] Dodds K. Hollywood and the popular geopolitics of the war on terror.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8, 29(8): 1621-1637.
- [33] Calcutt B. Just war theory and the war on terror. *Journal of Policing Intelligence & Counter Terrorism*, 2011, 6(2): 108-120.
- [34] An N, Zhang J, Wang M. The everyday Chinese framing of Africa: A perspective of tourism-geopolitical encounter. *Geopolitics*, 2020. DOI: 10.1080/14650045.2020.1807957.
- [35] Power M, Campbell D. The state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2010, 29(5): 243-246.
- [36] Thrift N.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London: Routledge, 2008.
- [37] Anderson K, Smith S J. Editorial: emotional geograph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1, 26 (1): 7-10.
- [38] Srinivasan K. Remaking more-than-human society: Thought experiments on street dogs as "natur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9, 44(2): 376-391.
- [39] An Ning, Zhu Hong. Examining Chinese geopolitical discourses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sthumanism.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6): 838-848. [安宁, 朱竑. 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地缘政治话语研究. *地理科学*, 2018, 38(6): 838-848.]
- [40] Dittmer J. Geopolitical assemblages and complexit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4, 38(3): 385-401.
- [41] Koopman S, Dalby S, Megoran N, et al. Critical Geopolitics/critical geopolitics 25 years on. *Political Geography*, 2021, 90: 102421. DOI: 10.1016/j.polgeo.2021.102421.
- [42] Tuathail G Ó. Localizing geopolitics: Disaggregating violence and return in conflict regions. *Political Geography*, 2010, 29(5): 256-265.
- [43] Taylor I.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London: Routledge, 2006.
- [44] Martin D, Johnson P. *The Struggle for Zimbabwe: The Chimurenga War*.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 [45] Alao A. *Mugabe and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in Zimbabwe*. Montreal: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 [46] Youde J. Why look east? Zimbabwean foreign policy and China. *Africa Today*, 2007, 53(3): 2-19.
- [47] Shen Xiaolei. Land deprivation, racial apartheid and national revolts in colonial era of Zimbabwe. *Journal of World Peoples Studies*, 2016(4): 1-14. [沈晓雷. 津巴布韦殖民时期的土地剥夺, 种族隔离与民族反抗. *世界民族*, 2016(4): 1-14.]
- [48] Bowyer-Bower T, Stoneman C. *Land Reform in Zimbabwe: Constraints and Prospects*. Aldershot: Ashgate, 2000.

- [49] Zeng Qiang, Li Weisong. Situation of Zimbabwe and its "Look East Policy". *Asia and Africa*, 2007(5): 36-40. [曾强, 李伟松. 津巴布韦局势及其“向东看”政策. *亚非纵横*, 2007(5): 36-40.]
- [50] Matondi P B. *Zimbabwe's Fast Track Land Reform*. London: Zed Books, 2012.
- [51] Ettinger A. Principled realism and Populist sovereignty in Trump's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0, 33(3): 410-431.
- [52] Massey D.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1994.
- [53] Harvey D.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1997.
- [54] Amin A. Spatialities of globalis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2, 34(3): 385-399.
- [55] Dittmer J. Putting geopolitics in its place: Gibraltar and the emergence of strategic locations. *Political Geography*, 2021, 88: 102405. DOI: 10.1016/j.polgeo.2021.102405.

Zimbabwe's dynamic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Perspective from critical geopolitics

AN Ning

(School of Geography, Centre for Asian Geography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how China builds its national image has become a complex and comprehensive issue needs to be urgently addressed. The study uses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ory as theoretical tool and employs a field survey in Zimbabwe as an empirical evidence to investigate Zimbabwe'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and its related mechanism.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Zimbabwe'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is no longer dominated by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based on its colonial history and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led by its national propaganda. In contrast, in the context of its fast-track land reform policy, China's "going out"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increasingly close ties with the African continent,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global geopolitical turbulence represented by Trumpism, Zimbabw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lations has begun to undergo drastic chang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subjects (including states, governments, political parties, associations,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have also become extremely complicated and Zimbabwe's percep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has therefore no longer been influenced only by historical events. More specifically, China's national image is also influenc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migrants, and their social practice in Zimbabwe. Moreover, these social practices have interacted and negotiated with the changes in Zimbabw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lations, thereby affecting the continuous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Zimbabwe. This study exte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discourse in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ory and strengthens the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Practicall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other countries' building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which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narrative of how to build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critical geopolitic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national image; discourse; Zimbabwe